

部认为，广西的社会经济要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在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同时，更要实施自治法。如果说广西的社会经济是鸟身，那么实行开放政策和实施自治法就是鸟的一对翅膀，只有这对翅膀一起振动，广西的社会经济才能腾飞。

但现实中也存在实施自治法不力，行使自治权不活的情况。主要问题在于：

其一，思想上忽视民族特点，否认民族差别的存在。认为少数民族的特点是造出来的、找出来的，自治地区也是人为造出来的。因此，对自治法的实施和自治权的运用完全忽略，认为是少数民族的事，不屑一顾。

其二，权限的划分需要进一步明确。过去在政治上过分强调中央集权，忽视发挥地方的积极性。在民族问题上就是中央政府的一些职能部门不肯让利放权，不尊重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权。在实践中，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对上级国家机关不适合的决议、决定、命令和指示提出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的要求，而上级国家机关往往既不否定也不同意，长期不作答复，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亦无可奈何。据了解，多年来在民族自治地方几乎从未有过“变通执行”或“停止执行”的先例。这一重要的自治权也就形同虚设。

由于宣传教育不够，一些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自治意识较差，大多对自治法较生疏。加之长期“左”倾政策的错误影响，也束缚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一些干部“唯上”是从，大小事都要请示，连职权范围内的事也不敢拍板，使自治地方有名无实，自治权成了“聋子的耳朵一摆设”。

其三，经济上，少数民族地区大多经济落后，长期要靠中央财政补贴才能平衡收支。背着这个沉重的“救济”包袱，少数民族自治地方很难理直气壮地行使自治权。

研究者在调查中曾询问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干部，自治权体现在哪些方面？有人回答：有民族地区补贴，可以生两个小孩，高考时加分（徐杰舜等，1997：25）。这些的确是政府照顾少数民族政策的一部分，但与行使自治权相距甚远！

毛泽东同志曾说过：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万万不可粗心大意。民族政策对民族（族群）关系的影响是直接而重要的，为国家计为民族计，各国的执政党和政府对此问题都应该充分注意。

（中央高级党校教授、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所博士研究生）

生）

主要参考文献：

- 郝文明等，2000，《中国周边国家民族状况与政策》，民族出版社。
- D.L.Horowitz，1997，“减少民族冲突的优待政策”，马戎编《西方民族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天津人民出版社。
- 宁骚，1995，《民族与国家》，北京大学出版社。
- Pettigrew, T.F, “民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民族社会学研究通讯》2001年第24期。
- 田继周等，1993，《中国历代民族政策研究》，青海人民出版社。
- c.a.托卡列夫和c.h.托尔斯托夫，1980，《澳大利亚和大洋洲各族人民》（上册），三联书店。
- 吴仕民等，1995，《中国民族政策概览》，人民出版社。
- 徐杰舜等，1997，《实施自治法研究》，广西民族出版社。
- 赵延年等，1993，《中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90年代发展战略探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学术对话】

游走在田野与文本之间

——Y村调查琐谈



胡鸿保、姜振华¹

(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2)

胡鸿保按:为了撰写硕士学位论文,姜振华同学1999年7月、2000年1月到山东省菏泽市的Y村做了几次实地调查,了解农村在发生了急剧的社会变迁的时空背景下女性在生育、婚姻等各个方面的变化,以期透析现代化语境中农村女性自主性的重构与发展。关于这些调查和在此基础上展开的学位论文写作,我作为指导教师与学生断断续续有过些对话,话题涉及Y村的某些细节、它的人文生态背景、社会调查和研究的有关方法、女性主义、生育等。我们将谈话的部分内容整理成文,以展示一种人类学文本的打造过程,同时希望有更多学者关注农村实地调查和妇女研究。

关键词:田野调查,山东农村,妇女研究。

胡鸿保(以下简称胡):我曾和我说起你幼时一度由姥姥带领,就在“Y村”住了几年,村里如今仍旧有一些你儿时的伙伴。回到自己熟悉的村落去做实地考察自有不少便利,且不说感情上的亲近,仅从调查的条件来说,在熟悉的社区容易获得翔实可靠的资料便是个不争的事实。

姜振华(以下简称姜):的确如此,中国社会学史上就有好几个经典的例子,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林耀华的《金翼》以及杨懋春的《中国山东台头村》等等。

胡:它们是中国人类学家对本土文化研究的有益尝试。我想顺便指出,上面几本著作最初都是用英文在外国发表的,这是现代中国学术史上的有趣现象。

姜:在自己熟悉的社区做调查至少具有语言或方言上的优势、易于获得当地人的信任从而能够较深地融入当地人的生活中,而且调查者对当地风土人情、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把握也易于对社会生活做多种模式、多因素的分析。费孝通对江苏吴江开弦弓村所做的开拓性研究就是学者们耳熟能详的一个实例。费孝通是本地人,再加上他的姐姐与村民的特殊关系,所以调查起来比较得心应手,“农民朋友们总是有问必答”²。

胡:另外,读人类学史可以了解到,对调查地点的选择多半具有偶然性。费孝通后来自称进入江村调查是无心插柳成荫。

姜:这种偶然性在很大程度上与他在当时的调查条件有限有很大关系,单枪匹马作调查的现实条件下最好因地制宜,选择自己熟悉的社区,充分利用自身的社会资源,有望事半功倍,实现对人文世界的深层描述和理论观照。

胡:这也是我让你选择自己家乡作为调查地点的一个重要原因,调查资金、时间等各方面的限制使你只能深入到一个小范围的社区中,尽量利用现实的条件去接触实际,也可以说是一种无奈之下的明智选择。上面你说到选点的“偶然性”,这似乎引出一个重要的、无法回避的问题,即对一个村庄所做的微型研究究竟具有多大的代表性,小地方能不能反映大社会?

姜:我想所有做社区研究的人都会面对这一问题。正所谓个别中包含着整体,微型研究必然能够反映中国整体社会的某些具体特征;但是对一个社区的研究最多只能是一种关于中国社会的“地方性知识”,迄今为止这仍然是一个无法反驳的事实。费孝通的《江村经济》自然也面临着这一问题,他的目标是了解整个中国社会,而不仅仅是在某个社区内验证某种理论。费孝通采用了类型学的方法,来完成对中国社会的整体把握,于是在江村以后,便有了对“禄村”、“易村”、

¹ 作者简介 胡鸿保(1948—),男,人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人类学史研究;姜振华(1975—),女,社会学硕士,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教师。

²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M].北京:三联书店,1996.:31。



“玉村”等农村社区的调查研究。可见，采取类型学的方法也算是解决小地方与大社会二元对立矛盾的一种有益的尝试吧。此外王铭铭也专门著文论述了小地方与大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社区研究如要包容中国社会的特点，就必须对国家与社会关系、古代理念与社区现状、传统与现代加以综合考察，探寻一种既能够表述历史过程又能够展现不同社会—文化力量的交错与互动的文本模式³。

我在论文写作过程中，也一直在考虑“一般”与“个别”的关系，希望能在自己的分析中包含更多复杂的因素，以便使调查具有更大的代表性。另一方面，由于我主要关注的是如何了解农村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生活感受，注重考察女性的主观经验，代表性的问题在这里似乎便显得不是那么重要。而且在女性研究领域，重视女性日常生活、关注女性个体的境遇、不强调一般正逐渐成为一种探索的方向。

胡：你的调查是深入到一个农村社区，那么选择何种适宜的调查研究方法也是一个颇费斟酌的问题。

姜：具体而言，方法的选择是与研究对象、分析层次以及研究预设等各个方面密切相关的。我的调查目的是通过了解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以及社会文化力量与人之间的互动，来探究女性自主性的发展，因此我主要采用了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的方法。参与观察法有其方法论上的渊源。马克思·韦伯一反过去实证主义的传统，从个人及其行动角度研究社会。他认为只有深入行动的主观方面理解意义和动机，才能说明行动的原因、过程和结果。H·G·布鲁默强调研究活动本身是一种互动过程，研究者在研究中应扮演研究对象的角色，通过观察和抽象建立理论和命题，亦即参与观察法。⁴因此对生命世界的研究，应着重了解人们的所思所想并探索行动者背后的深层的文化结构及价值理念。所以我认为，若从农村女性的日常生活入手，采取参与观察与深入访谈的方法应较为理想。

另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女性研究在其实践中也发现定性研究方法很适合于自身的研究，我的研究采用参与观察和深入访谈的方法便得益于女性主义研究策略的启发。女性主义研究认为，从启蒙思想开始，西方所有的大型理论虽然都亮出普遍性和性别中立的招牌，但实际上都是以男性为标准去解读女性。女性的主观经验与价值被淹没在标榜客观、中立的宏大历史话语中。女性主义认为那些自认为独立而客观的实证主义研究实则是以男性视角、男性经验为中心的，它忽略了女性的经验和认识。冰冷、空洞的资料背后看不到女性的存在，女性声音的淹没造成了女性在社会历史中的“缺席”状态。因此女性主义认为非实证主义的方法，如开放式访谈更适宜于女性主义研究。这些方法偏重于解释，依赖于研究者深入到社会环境之中去，目的在于研究者与研究对象二者之间的理解。女性主义认为研究者应带着感情去倾听女性的叙述，要善于从她们所处的特定语境中去理解她们的心声。在访谈和研究中，应以访谈对象为主体，建立访谈者和访谈对象平等互动的关系。⁵

胡：研究方法的采用并无一定之规，不妨把各种方法看作是互相补充的，对它们做绝对的分割，或一定要分辨孰优孰劣，这种思路不见得可取。

姜：所以说，切实把握不同的方法所体现的共同的科学精神，针对某一具体问题采取最适用的方法才是最为可行的。我们不必去用方法来寻求问题，而是该就问题来寻求研究方法，关键在于问题解决得怎样。虽然我的调查并不能算是严格意义上的人类学的田野调查，但是许多人类学的观点与方法还是值得借鉴的，譬如说从边缘看主流的观点、跨文化的比较研究、参与观察等

³ 王铭铭. 小地方与大社会[J]. 社会学研究, 1997, (1): 92. .

⁴ 吉明坚. 变迁中的田野作业：作为一种人类反观自身社会与文化的工具[J]. 沈阳师范学院学报, 1999 (4): 31.

⁵ 鲍晓兰. 女性主义和倾听妇女的声音[A]. 徐午主编. 社会性别分析[C]. 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 2000. 175—176.



方法。

胡：至于说到比较的视角以及“人类学的观点”，我想你作为女性在这方面也有天然的优势。

姜：怎么说呢？

胡：笼统说，传统汉人社会的主流文化是男人或男权文化。你身处这传统文脉之中，又吸取了现代的“平等”思想；作为一名知识女性去基层找妇女访谈，既有身份认同、又有研究者与被研究者之间的必要的张力，这样一种地位该可以算是优势了吧？另外，费孝通跟后生谈起他与前妻王同惠一起做田野工作时也表达了类似的感慨，“女性在做人类学考察方面好象比男性更有优势，她们很容易与人交往”。⁶

姜：作为一名受过专业训练的知识女性来说，做性别研究的确有着男性无法比拟的优势。女性研究者对于女性的生活、女性的处境会有更为深入的了解和体会，因而在做性别研究时具有易于沟通、容易获得信任等优势，这种身份认同能够使女性研究者较少受到男性主导观念的影响，从而以女性的立场、女性的出发点去发现许多不易为常人所关注的问题。这种研究中的女性视角和性别敏感性有助于拓宽研究视野，增加分析的力度和深度。

胡：你在调查中的性别视角会使你更加注重女性的经验和性别关系，这对于只注重男性经验的传统调查来说，可以称得上是一种补充和纠正吧。

姜：我之所以强调我在调查中所持的性别立场，也是有感于女性在调查者视野中的“缺席”。田野调查的片面性和对弱势力量的忽视，会导致获取信息的失真和片面，甚至会得出错误的结论。例如，人们在做田野调查时往往会注重对当地比较有影响的人的调查，在进入一个农村社区时，往往会向当地的精英和家族族长获取有关当地的社会文化方面的信息，并以此作为权威的东西，而忽略了对其他人的调查，实际上对当地历史的社会记忆是由不同群体、不同力量和男女两性共同创造的。与此类似的是，人们往往只注重对男性的调查，而忽视了女性的经验。男女两性对事物的观察角度以及对于事件的兴趣点常会存在差别，因而对同一事件他们会有不同的感受和不同的关注点，因此同时关注男女两性的经验，可以获得全面的知识，同时这两种经验又可以相互补充和验证。

胡：男性学者进入父系继嗣制社会做研究的学术兴趣与女性学者显然有很多差异。我想他们忽略了你当前所选取的角度和分析策略，这恰恰表现出你的研究是有价值的。其实有不少女性学者已经为纠正“男性偏见”做出了很多努力，美国女人类学家玛杰里·沃尔夫(Margery Wolf)就是一个代表。你已经看过她的著作《林家》，我想听听你对她的“林家”研究的感受。

姜：玛杰里·沃尔夫在1958年随其丈夫美国人类学家武雅士(阿瑟·沃尔夫, Arthur Wolf)到台湾做田野研究，他们在一林姓人家居住了两年，所以玛杰里·沃尔夫有机会搜集到关于林家及林家所在的村庄较为详细而全面的资料。几年之后，当玛杰里重新整理这些资料后撰写了《林家》这本书，书中独特的女性研究视角使其获得了人们的关注和好评。在玛杰里之前，人类学研究基本都以男性为主导，其研究旨趣和研究主题也都带有男权文化的痕迹，他们很少真正关注女性的生存感受和在家庭中的生存模式。而玛杰里凭着女性的敏锐和女性研究者的有利身份将目光投注到为男性学者所忽略的地方——家庭内的人际关系和权力利益冲突、家庭内女性的作用及其生活经历。林家是村里的富户，其家庭结构是典型的大家庭结构——由Lim Chieng-eua 的妻子儿女和其寡嫂 Lim A-pou 的一家组成。与男性学者关注父子关系及其冲突形成鲜明的对比，玛杰里·沃尔夫的兴趣点在于母子关系以及婆婆为保持儿子的忠诚而与儿媳展开的竞争。Lim A-pou 就是这样一位母亲，她在实际上影响着儿子的意志，以此与丈夫弟弟的一家相抗衡。⁷ 玛杰里敏

⁶ 费孝通等. 关于西部人文资源研究的对话[J]. 民族艺术, 2001, (1): 15.

⁷ 参见 Wolf, Margery. 1968. *The House of Lim: A Study of a Chinese Farm Family*, New York: Appleton Century Croffs.



锐地发现了中国家庭中女性的主体地位和她们对抗父权制家庭的生存模式，这为她今后提出“子宫家庭”（Uterine Family）的概念奠定了基础。除此之外，玛杰里还描写了林家不同类型、不同处境、不同个性的农村女性，揭示出了在当时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中国农村女性的命运与生存状况，其中她对童养媳所表现出的浓厚兴趣使人们对于中国女性的悲惨处境有了更为感性和深刻的了解。玛杰里的林家研究显然为人类学的研究增加了社会性别的视角，毋庸置疑，她的女性意识、女性的出发点都对我的研究有很大的启发，促使我运用社会性别的视角去研究农村女性，这样我在研究中就能摒弃一些对女性想当然的观念，从而发现生动鲜活的女性生活经验和被男性经验所忽视的研究角度。

胡：玛杰里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谈到自己做田野的体会，其中特别讲了她的台湾林家研究⁸，我想你不妨找来读读。除了性别的视角外观察的距离也值得重视。日本人类学家末成道男曾经提出“家乡人类学”的概念，并尝试做这方面的研究，费孝通也在理论上对所谓“进得去”、“出得来”的问题作了探讨⁹。我想你的实地调查在这方面还是会有不少感受的罢？

姜：感受颇多。保持适度的观察距离便是一个很难处理的问题，要同时做到“进得去”与“出得来”是一个比较困难的事。一方面，Y村是我的家乡，我对那里的风俗人情都比较了解，既没有语言上的障碍，又能很快获得Y村人的信任和理解，所以在“进入”和深入到Y村时，我能够凭借自身所掌握的资源来获取我需要的东西。另一方面，“深度沉浸”又不免使我在调查中掺杂着许多感情色彩，影响到所获取信息的客观性。我和Y村的很多人都有亲戚关系，调查时在感情上就会有所偏向，同时也难免会牵连到村中人的是是非非中去。所幸的是自己所受的专业训练时刻提醒我要扮演一个中立者的角色，这在很大程度上缓和我具有双重身份的尴尬处境。

胡：你作为一名知识女性与农村女性去交谈、打交道，虽然你的女性身份为你们之间的相互沟通和理解创造了一定的便利，但是你们的生活环境、生活经历、知识结构等都有着很大的差异，这对你的调查来说也是一个障碍。

姜：的确，在调查中我有一点很深的感触，便是不能对研究对象做想当然的阐释和理解，因为我毕竟对农村女性的生活无法获得完全的认知与了解，生活经历的不同所造成的隔膜和思想观念的差异，都在不同程度上造成我对当地女性生活理解的偏差。倘若我以先入为主的观念和自身的实践经验出发去理解农村女性，那么她们就会做出各种防护性的反应，向我传虚假的信息。例如，有一次我和一位结婚已有半年的女性聊天，当时我已经知道她已怀孕，便问她已有几个月的身孕，而她却说还没有怀孕。对此，我感到很惊奇，以为自己弄错了。后来才知道她的确已经怀孕，只是农村女性有时羞于在外人面前提及自己怀孕的事情，所以才谎称没有怀孕。这件小事让我意识到，调查者和被调查者的知识体系有时有着很大的差别，调查过程也是双方的知识冲突、碰撞和交融的过程。倘若调查者抱着居高临下的态度去理解被调查者，往往会适得其反。所以在田野调查中尽量排除自己的主观看法，从农村女性自身的角度去了解她们的喜怒哀乐、情感经历和价值观念。

胡：可见调查过程同时也是一个理解的过程，运用“移情”的方法去了解被调查者是很重要的。另外在表述时你也应该注意到调查者与被调查者的互动关系。

姜：我在调查过程体会到调查者和被调查者之间是互为主客体的关系，调查者在调查过程中同时也会受到被调查者的观察和揣摩。所以我在田野材料的书写中也注重表现二者之间的互动关系，“我”作为故事的叙说者，不再隐身于故事的幕后，而是在与被叙说者的互动中展示自己对

⁸ 参见 Wolf, Margery. 1990. Chinanotes: Engendering Anthropology, in Roger Sanjek ed. *Fieldnotes: The Making of Anthropology*, pp. 343-355.

⁹ 参见 末成道男. 研究东亚的自身社会的人类学[A]. 费孝通. 再谈人的研究在中国[A]. 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编. 东亚社会研究[C].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3.



事实的发现和对女性经历的理解，通过对具体化的事实的分析来达到对研究对象的更深层次的认识。在对故事的叙说过程中，我试图表现调查者与调查者的沟通与交流，展现农村女性的主动性和潜能，让她们能够表达自己的声音和思想，因此我采用了“多声部”(multi-voices)的叙事策略，除了我的客位描述和分析之外，也有女性对自己生活经历的主位陈述。

胡：这样很好。我以为毕竟是“文人”，打造学位论文，最后一步总归是靠文本表达的。只不过我们学科的特点是注重田野，所以你读了前人的文本之后进入自己的田野，然后又回到文本来与他人对话——不但与国人对话，而且与洋人对话；既与学者交流，也与百姓交流——这才取得同行们的认同。

《社会学人类学丛书》出版信息

第 23 卷 书稿名称：《青城民族——一个边疆城市民族关系的历史演变》

字数：14 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作者：王俊敏（北京大学社会学硕士，内蒙古行政管理学院副教授）

内容简介：本书为作者在呼和浩特市多年从事民族居住格局的历史演变和民族关系现状实地调查的研究成果。作者仔细查阅了近代百年来呼市汉族、蒙古族、回族、满族 4 个主要民族群体在城市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所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特别对现在呼市各个城区的民族格局、族际通婚、语言使用、民族交往等民族社会学的核心专题进行了深入系统的调查研究，把国内外民族社会学的理论和研究方法运用于个案研究，系统调查分析呼和浩特这样一个有特色的中国多民族城市，在理论与应用两个方面都有一定的创新性和学术贡献。

本文的基础是作者在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完成的硕士论文，指导教师为马戎教授。在 1996 年顺利通过论文答辩后，作者返回呼和浩特市工作，并在近 4 年中继续开展这一专题的实地调查与研究。由于作者在历史文献的整理分析和目前实际情况调查研究两个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这本著作从社会实际调查资料出发、兼顾了历史发展轨迹，实际上是一部社会学角度来研究撰写的一个城市的民族关系发展史。

读者对象：研究工作者，研究生，国家干部，城市规划工作者，基层管理干部。

第 24 卷 书稿名称：《中国区域发展模式的社会学分析》

字数：20 万字。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1 年出版。

作者：张敦福（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政教系副教授）

内容简介：国内与国外广泛应用“区域发展模式”一词，但在应用中参照体系和强调的内容差别甚大，本书在对国内外“区域发展模式”文献的广泛分析之中，试图从方法论的角度，对“区域发展模式”的定义、内涵、层次、应用范围整理出一个理论框架和指标体系，并依此对现有关于“区域发展模式”的文献予以归类分析，在此基础上对 21 世纪我国的各层次“区域发展模式”提出一个整体规划设想。

书稿价值及特点：目前我国对“区域发展模式”讨论甚多，但缺乏方法论的讨论与整理，有的模式地域范围大至数省，有的小到几个乡镇，对“模式”的归纳方法各有强调，缺乏统一规范的方法。本书在方法论方面的规范化尝试与应用将是本书的最大特点。在学术研究上有重要的价值，为地方政府规划区域发展也可提供方法上的参考。

读者对象：研究工作者，研究生，国家干部，

